

第45个世界粮食日



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这是唐代李绅的《悯农》诗二首其一。这首诗，我们自小都学过，相信每个人随着学习积累和阅历增长，对这首诗背后体现的稼穡艰难理解越来越深。中国是农业发祥地之一，据相关考古考证，我国农业已有八九千年历史。数千年来，在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的基础上，我们发展建立起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。在文化的大江大河里，流淌着中华文明的精神。

稼穡不易，民生多艰，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崇尚节俭的文化。据《尚书·太甲》记载，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，大臣伊尹就对刚刚继位的太甲提出嘱咐：“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。”伊尹这番话的意思是一定要注意节俭，只有保持节俭的品德，江山基业才能永恒。西周的名臣周公在辅佐成王时，也告诫周成王一定要节俭。在周公辅佐下，周成王后来也教导臣民们，要“位不期骄，禄不期侈，恭俭惟德”。被视为大道之源的《易经》指出：“君子以俭德辟难，不可荣以禄。”意思是，君子靠节俭的德行才能规避灾难，千万不要一味贪图荣华富贵。

所以，孔子直接提炼出“温良恭俭让”五德，“俭”因此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内容，而且具备了道德评判标准。在《论语》中，比较受孔子欣赏的学生大多具有节俭的品德，比如颜回和子路。颜回的事迹我们很熟悉：居住在陋巷，单食瓢饮，安贫乐道。因此颜回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，被尊为复圣。子路也是一个具有节俭德行的人，孔子评价他：“能够穿着破旧的衣服，但是跟衣着华贵的人站在一起毫不逊色的，大概也就只有子路了。”

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。《国语》记载，公元前599年，周定王派重臣刘康公出使鲁国，刘康公观察鲁国大夫们，注意到季文子、孟献子都很俭朴，叔孙宣子、东门子则极为奢侈。刘康公就断言：季文子、孟献子两家家道长久，叔孙宣子、东门子两家则会败亡。后来，果如刘康公所言。

从以上先秦典籍中记载古圣先贤的事迹和言行看，节俭从我们文化的源头就已经成为一种高尚的德行。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，某种行为或者现象一旦被赋予伦理道德的价值，在日常生活中就具备了被尊崇的道义力量。

（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）

天下粮仓 万民之命

——我国古代节约粮食的故事

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

汉代初期贾谊提出“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”，指出积贮粮食是治国之本。粮食生产有周期性，所以一定要有储备才能维持人们食用。历代大小政权都特别重视粮食储存。粮食产地与食用地很多时候并不一致，故粮食运输在古今都是必需的。古代非常重视粮食的储存和运输，尽量减少中间成本。古代粮食运输多采用成本低廉的水运，为此陆续修建了中国大运河，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。

一般来说，粮食仓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种是供应官民食用的仓，另一种是用来周转运粮的仓。粮食运输在古代利用水运是比较合算的方式。漕运是通过水路运输粮食的一种形式。通过水路运输粮食，不可能依靠同一艘船一次运到，必然需要有适应不同河段航行的船只和水工分段运输。为了方便远距离存储与转运粮食，官府往往在河道沿岸的枢纽地点设立仓储，用来储藏从各地运来的漕粮，然后根据不同河段水位流量以及需要等情况，再转运到目的地去，所以称为漕仓。

隋代立都长安，京畿之地粮

库空虚，需要从关东地区向长安调运粮食。仓城遗址均选择在依山傍水或地势较高且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，形成一个仓储与大运河通济渠或永济渠、黄河的漕运水系紧密相连的关系。这一时期的大型粮仓多集中于洛阳及其附近，如回洛仓、河阳仓、洛口仓和含嘉仓，由此可见洛阳作为漕运中心的地位和作用。

要保证仓储制度运转，不仅要在河道沿岸设立漕仓，还要保障水运畅通，节约运输费用。中国古代历代官府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修建漕仓、治河，就是为了保漕通运。

漕运需要可供航行的河道才能输送粮食。中国的河流多是自西往东流，上下游落差较大，通航条件并不优越。因缺乏南北向河流，故需要修建大运河沟通水系，实现南北运输畅通。隋炀帝时期大规模修建运河，不仅加强了东西向运输，更首次实现了南北向沟通。

作为维系国家生存的仓储制度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

视，但如何平衡仓储与河道运输能力之间的关系，减少治河、漕运成本，也是官府考虑的重要问题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汉武帝初年：“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”唐代元结记载：“开元天宝之中，耕者益力，四海之内，高山绝壑，耒耜亦满。人家积储，皆及数岁。太仓委积，陈腐不可较量。”这两例都被众多史家作为盛世经济发展的体现，但在古代囤积这么多的粮食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，运输的费用相当高，并非合理，粮食陈腐不可食正是官府不体恤百姓的表征，透露出汉唐盛极而衰的迹象。

由此可知，中国古代一般会考虑仓储与漕运成本之间的关系，不会因为仓储的重要而不顾成本去治理河道，增加漕运，造成巨大浪费，甚至会在仓储较为充足的情况下暂停漕运，节约民力；但在古代不计成本漕运的现象仍不断出现，破坏了沿河地区的生态环境，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
（来源：人民网）

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

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良传统。从古至今，我们都十分重视节约粮食。春秋时期，古人即在《左传·庄公》中提出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”的观点。

说起节约粮食的古诗词，就不得不提唐朝宰相李绅所作的《悯农二首》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”两首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农田里劳作的辛苦景象，也成为大多数人对于节约粮食的最初印象。

除了诗词，古代的画作中也

有不少对于劳作景象的描绘。《耕织图》即是我国古代为劝课农桑，采用绘图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与蚕织的系列图谱，因为“图绘以尽其状，诗文以尽其情”，扮演着普及农业生产知识的角色，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传递节粮风尚的作用。

在节约粮食方面，我国古代有着良好的文化传承与家风教育，在家书与家训中，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家风教育传承的必修课。

北宋时期，文学家、美食家苏轼曾作《节饮食说》告诉家人，“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，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。”“有尊

客盛饌则三之，可损不可增”，将自己的日常饮食限定于一荤一酒，即便请客赴宴也不超过三个肉食，如此，既“安分以养福”，又“省费以养财”。隔代苏公有知音，五百年后，明朝文学家、画家陈继儒行书东坡《节饮食说》，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苏轼“节饮”思想的辐射力早已超出家风的范围。

到了清代，朱柏庐写下有“治家之经”美誉的《朱子家训》。在这部以家庭道德教育为主的启蒙教材中，朱柏庐阐明了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的节粮箴言，为后世所称道与遵循。（来源：光明网）

谷不可以三月而得

在人类文明进程中，再也没有比粮食更特殊、更重要的存在了。“五谷者，万民之命，国之重宝”，意即粮食安全是天下百姓生命之所系，粮食丰歉影响国运兴衰，是国家之宝。

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齐国大臣管仲便深刻认识到这一点。《管子·轻重戊》记载，鲁、梁两国是齐国称霸大业中的两个强劲对手。一次，齐桓公就如何应对这两国问计于管仲。管仲答曰：“鲁梁之民俗为绌。公服绌，令左右服之，民从而服之。公因令齐勿敢为，必仰于鲁梁，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绌矣。”他认为，鲁国和梁国的百姓，素来以织绌为业，可以高价引诱两国向齐国大量供应绌，而放弃农业生产。

齐桓公命令齐国上下全穿绌服，一时间，齐国绌制品价格大涨。鲁、梁两国

国君看到有利可图，便下令鼓励百姓大力织绌，两国百姓几乎全部出动，忙着种桑织绌运绌，再也没人愿意种庄稼。

十三个月后，鲁、梁两国早已因全民织绌而荒废了农业生产，百姓“饿殍相及”，两国国君这才意识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，急忙命令百姓返农。然而为时已晚，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”，存粮也难以继，两国相继发生严重饥荒。最终，两国百姓几乎逃亡殆尽，国家已名存实亡，只得请求臣服于齐国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服帛降鲁梁”故事。

洪范八政，食为政首。除了管仲，我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、思想家都意识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的盛衰、存亡。他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农业和粮食生产，看到粮食是民生之本，粮食安全问题本质上是民

生问题，叮嘱“民为国基，谷为民命”，强调“仓廩实，天下安”，要做到“无事而为有事之备，丰岁而为歉岁之忧”。

（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）



（本版图片均由AI生成制作）

古诗中的粮食

田家

宋·范成大

登出耕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
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
乡村四月

宋·翁卷

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
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

田上

唐·崔道融

雨足高田白，披蓑半夜耕。
人牛力俱尽，东方殊未明。

归园田居·其三

东晋·陶渊明

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
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
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
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

新晴野望

唐·王维

新晴原野旷，极目无氛垢。
郭门临渡头，村树连溪口。
白水明田外，碧峰出山后。
农月无闲人，倾家事南亩。

成语故事

真假隐居终南山

在唐代，有一条特殊的“捷径”——它不是官道，却通往官场；它名曰隐居，却通向繁华。这条捷径，就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。

终南山，又名太乙山、中南山，简称南山，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内涵，古代隐居于终南山的人众多，比如东方先贤老子、药王孙思邈、汉初三杰之一张良这样的真隐士，他们或是不愿与官场之人同流合污，或是官场失利后追求宁静淡泊的生活。

在古代，一个人如果下定决心做隐士，别人便觉得他淡泊名利，是个道德高尚的人。然而还有一群人，他们隐居的原因比较特殊——想凭借隐居之举抬高自身声望，提升身价，以此来谋求官职。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，在唐代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——正是所谓的“终南捷径”。

唐武则天年间，一位叫作司马承祯的隐士。武则天听说司马承祯的修行非常好，而且又饱读诗书，因此下诏邀请他到朝廷做官。可司马承祯是一位真的隐士，他只在长安住了几天，便要求回终南山继续隐居。武则天见挽留无用，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司马承祯离开长安的时候，许多官员都前来送行，卢藏用也在其中。卢藏用看了看司马承祯，用手指着终南山的方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那里另有妙处啊！”

司马承祯听了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在我看来，终南山却是一条做官的近路啊。”一句话说得卢藏用非常尴尬，无地自容地走开了。从此，“终南捷径”成为追求名利最近便路线的代名词。但嘲笑归嘲笑，后来效仿卢藏用走这条“捷径”的人却越来越多。

王维第一次隐居终南山时，年仅十六七岁，也带着类似的功利心——他在山中创作诗歌，结交名士，就是希望通过“隐居”的标签扩大知名度，为日后入仕铺路。

王维比较幸运。玉真公主极为赏识他的才华，便向主考官极力推荐，最终使王维年纪轻轻就踏上仕途，并名扬四海。可见对很多文人而言，终南山的“隐居”更像是一场“自我营销”，本着“以隐求仕”的需求，让终南山成为仕途规划中的重要“跳板”。

总之，这种通过隐居以求官的做法，之所以在唐代成为风尚，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。一方面，社会推崇隐士的高洁；另一方面，文人又普遍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。“终南山”恰好成为连接这两种价值观的桥梁。

因此，这座距离长安仅数十里的山脉，不仅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，更成了一条通往官场的“特殊道路”。它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梦想与失落，也孕育了“终南捷径”这个充满智慧的成语。

（来源：《北京青年报》）